

XIN ZHONG GUO JIAO YU GAI GE YAN JIU

新中国教育 改革研究

廖其发 主编
重庆出版社



xin zhong guo jiao yu gai ge yan jiu

- 重庆市政府博士基金重点课题
-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委级重点课题

新中国教育 改革研究

廖其发 主编

重庆市政府博士基金重点课题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委级重点课题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张培华

封面设计 卢 军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廖其发 主编

新中国教育改革研究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381 千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5366-3492-7/G·1298

*

定价: 24.00 元

序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改革这一社会现象久已存在。改革的主观目的,一般说来,在于促进社会的进步。然而它是否依乎“天时”、合乎“地利”、顺乎“人和”,换句话说,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则是另外一事情。因此,改革有成、败之分,得、失之别。教育改革当然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至今,教育事业进行了多次改革,既有辉煌,又有坎坷。在这些用智慧铸就的辉煌和用血汗凝成的坎坷中,蕴藏着可供中华民族世代悟解的文化价值。像其他珍视并注意开发这份文化价值的人一样,廖其发等同志积累与思虑多年,编著成《新中国教育改革研究》,把见解与感触一并公之于世。

《新中国教育改革研究》紧靠具体的历史背景,于“教育综合管理改革”起步,历经“高等教育改革”、“中等教育改革”、“初等教育改革”、“学前教育改革”、“成人教育改革”,直至“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这根颇为粗硕的经线上,交织着刚劲的纬线,形成错落有致的格局。涵容在这一格局中的,不仅有对我国教育改革历程各方面的描述,而且有作者对各时期具体改革举措及利弊的评论和建议。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理论探索。从这些内容中,人们不难看到,50年代初期,为使教育权利完全回到人民手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50年代后期“教育革命”的兴起,

给我国人民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60年代“文化大革命”给教育实践和理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面向”的指导下探索迈进的。

掩卷思忖，人们也许会联想到：

教育改革不是一些天真的头脑所想象的，只要在“原样”上弄些奇特的差异，并冠以时髦的名称，就可以大享改革之誉的；

教育改革不是投机取巧者的勾当，可以不分析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在一番主观臆断之后，既不问“改”向哪里，又不问“革”在何方，就可以收获改革的果实的；

教育改革也不是急功近利者认为的一蹴而就的事情，这里需要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上推落后之陈、布现代之新，需要持续地下刻苦、扎实的功夫。

教育改革的使命，可否说，是一条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合目的性统一的费心竭力的实践活动。

新中国教育改革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却又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对教育改革历史的反思，需要时间的检验，更需要纯正地贯彻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存真求实。廖其发等同志充分认识到了课题的重要性，又不畏其难，这反映了他们的智慧与勇气。而智慧与勇气是做学问、干工作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我衷心祝贺他们的著作问世。

瞿葆奎

1995年12月于华东师大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一直持续不断。其中大的改革运动就有如下数次:建国初对旧教育的接管改造、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经验;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60年代初教育事业的调整;“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教育革命”;“文革”结束后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八九十年代对教育领域进行的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而具体的教育改革活动,就多得难以胜计。所有这些改革,其主观目的都在于建立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使之更适合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由于教育改革的设计者们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认识、对我国社会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教育模式的理解很不相同、对教育内在规律的把握、对我国教育领域中的实际状况的认识也很不一致,加之其它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得建国以来所进行的各种教育改革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过去所进行的各种教育改革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这些教育改革都可视为在自然状态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教育试验,其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都足供后人借鉴。后继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如果能借鉴这些经验与教训,就可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反之,就只能一切重新摸索,甚至重犯历史的错误。因此,研究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我国今后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新中国教育历史的研究望而却步。因而在较长时期内,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新中国教育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教育改革历史的研究。最近十余年来,新中国教育历史的研究开始列入议事日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与支持之下,编纂了《中国教育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中国教育大事典》等工具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通史》和大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全书》都有专卷介绍新中国的教育历史,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此外,出版了《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等少量专著,报刊杂志上也可散见一些有关新中国教育史的文章。所有这些研究,对人们了解新中国教育的历史都有较大帮助,特别是在史料的保存方面有较高的价值。但由于新中国的教育历史头绪纷繁,有许多史实人们还不甚明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教育历史不仅仅在于让人们了解历史,其主要目的是要使人们能以史为鉴,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原则性、普遍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中国今后的教育实践。也正是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探讨。

早在几年前,我们这些中青年学子怀着对祖国教育事业无限忠诚之情思,抱着促进新中国教育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希冀,不顾举鼎绝膑之危、贻笑大方之虞,决心研究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及理论。我们这里所讲的新中国教育改革历史是广义的,是指自新中国建立之时起到我们的研究暂告结束之前为止(1949~1994年)对旧有教育所作过的各种变革。限于我们的精力,我们主要选择其中的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来进行研究。这里所讲的新中国教育改革的理论也是广义的,既指现在和未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也包括各种具体的教育改革问题的有关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既有新中国早已过去了的教育改革,也包括新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和将来应当进行的教育改革;既包括教育改

革实践,也包括教育改革理论。对历史的研究是我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的源泉,而依据历史的经验进行理论的反思并提出现在和未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具体建议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或主要目的。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1990年10月,我们申报的《新中国历次教育改革研究》被列为重庆市政府、市科委博士基金重点科研课题。1991年8月,我们申报的《新中国教育改革史研究》被列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科研课题。1994年4月,这一课题又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委级重点研究课题。西南师范大学和重庆出版社也给予了多方支持,使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作好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力图贯彻以下一些研究原则:

第一,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要研究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理论,必须掌握充分的有关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材料。为此,我们认真地研读了各期《中国教育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中国改革全书·教育改革卷》、《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人民教育》等记载新中国教育史实的工具书和报刊,还阅读了一些地方教育志、地方教育档案,以及其它有关中国教育改革史实的书籍,掌握了基本的文献资料。为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我们还走访了许多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同志以及一些中青年同志,调查了一些基层教育单位,掌握了许多来自基层或第一线的材料。这些工作,使得我们的研究有较为坚实的基础。

第二,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相结合。为实现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不仅认真研究各种教育史料,也认真关注学术界关于教育理论的研究状况,关注现实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在研究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时,常常联系中国教育的现实与未来中国教育的去从加以认真反思;在研究中国教育现实与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理论时,也注意从新中国教育的历史乃至外国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求启示,从而尽可能改变历史研究、现实研究、理论研究相互脱节的状况,并在这几方面的研究中都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第三,历史研究方式和逻辑研究方式的一致。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①根据这一思想,我们一方面认真研究各种与教育改革有关的史实,使我们的研究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实际;另一方面,我们还注意抛开无关紧要的历史材料和一些偶然性的历史事实,尽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和内在的规律。

第四,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我们的研究既要宏观上研究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宏观调控,又要从中观上研究各级教育内部改革的历史与理论。为了做好这些研究工作,我们又注意从微观上研究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每一个具体的教育问题,特别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与具体问题,尽力找出这些史实与问题之中的内在联系,将其上升为宏观的或中观的理论与建议。

第五,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新中国教育改革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思想性极强,因而如何正确把握政治、思想的方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注意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此作为评判政治、思想是非的主要标准。但我们的研究毕竟是学术研究,它应当遵循严格的科学精神,并以揭示或说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原则为目的。

科学是无所顾忌和大公无私的，因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见解是符合科学原则的，我们都将真实地反映出来。同时，我们认为要贯彻我国的基本路线，要实现我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也特别需要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的支持。因此，我们的研究愈符合科学性原则，也必将愈符合思想性原则，故我们力求通过提高我们研究的科学性来坚持其思想性，使二者尽可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根据上述原则，经过全体同志几年的努力，我们的研究暂告结束。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我们的研究心得或研究成果。

为便于读者特别是从事实际教育工作的同志从中得到有关教育问题的信息或启示，书中采取了专题论述的形式。其中第一章论述教育的综合管理，即论述国家对教育进行宏观调控或管理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教育方针、教育领导体制、教育事业规划、教育法规、教育经费、教育队伍建设与管理等。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普通高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普通初等教育、学前教育、成人教育中的有关问题，如办学方向、学制、内部管理、思想品德教育、教学工作等，也就是说，这五章的每一节都各是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具体的教育改革问题进行的探讨，读者可从中了解每一个具体的教育改革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有关的理论及具体的改革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章的各节合起来，就构成某一层次教育改革的历史线索、理论和具体建议。前六章综合起来，就构成关于整个中国教育改革主要的实际问题的全面探讨。第七章则是在前六章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对几个基本的教育改革理论问题的探讨，是某些具体教育问题的理论向能指导整个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的升华。

尽管我们的初衷是要通过对有关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基本弄清有关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理论与今后的对策，但这一任务何其艰巨、繁复！我们的功力又何其浅薄！加之时间与经济条件的制约，使我们常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之感。再有因本书篇幅的

限制,不可能对其中的全部问题详加论述,只能讲清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主要的理论观点和主要的改革建议。由此种种,我们深感本书所作的研究还比较肤浅,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它毕竟代表了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基本思想,它是我们心血的结晶,也将是我们今后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起点。如本书能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引起人们对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理论以及其它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以推进关于新中国教育历史、现状、理论与改革对策的研究,则是我们之愿,也将是中国教育之幸。

本书错谬、缺失之处或许不少,竭诚希望大方之家和一切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的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注:

-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目 录

序	瞿葆奎 (1)
前言	(1)

第 1 章 新中国教育综合管理改革	(1)
第一节 新中国教育方针改革	(1)
第二节 新中国教育领导体制改革	(12)
第三节 新中国教育事业规划改革	(24)
第四节 新中国教育法规建设改革	(34)
第五节 新中国教育经费体制改革	(45)
第六节 新中国教育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改革	(58)
第七节 新中国招生制度改革	(76)
第八节 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改革	(96)
本章结语	(105)

第 2 章 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110)
第一节 新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方向改革	(110)
第二节 新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	(122)
第三节 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132)
第四节 新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141)

第五节 新中国高等学校德育改革	(151)
第六节 新中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改革	(161)
本章结语	(170)
 第3章 新中国中等教育改革	(173)
第一节 新中国中等教育办学方向改革	(173)
第二节 新中国中等教育学制改革	(186)
第三节 新中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	(197)
第四节 新中国中等教育内部领导体制改革	(207)
第五节 新中国中等教育教学改革	(217)
第六节 新中国中等学校德育改革	(229)
本章结语	(241)
 第4章 新中国初等教育改革	(244)
第一节 新中国初等教育办学方向改革	(244)
第二节 新中国初等教育学制改革	(254)
第三节 新中国初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262)
第四节 新中国初等学校教学改革	(270)
第五节 新中国初等学校德育改革	(284)
第六节 新中国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	(293)
本章结语	(301)
 第5章 新中国学前教育改革	(305)
第一节 新中国学前教育办学方向改革	(305)
第二节 新中国学前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314)
第三节 新中国学前教育卫生保健工作改革	(324)
第四节 新中国学前教育知识智能教学改革	(334)
第五节 新中国学前教育德育改革	(347)
本章结语	(355)

第6章 新中国成人教育改革	(358)
第一节 新中国成人教育办学方向改革	(358)
第二节 新中国成人教育内部结构改革	(369)
第三节 新中国成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377)
第四节 新中国成人教育教学改革	(387)
第五节 新中国成人教育德育改革	(396)
本章结语	(403)
第7章 教育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406)
第一节 教育改革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	(406)
第二节 教育改革与生产力的关系	(418)
第三节 教育改革与文化的关系	(433)
第四节 教育改革与人的发展	(445)
第五节 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验	(457)
第六节 教育改革与国外教育经验的借鉴	(466)
后记	(477)

第 1 章

新中国教育综合管理改革

所谓教育综合管理,是指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教育综合管理的性质与水平直接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前途与水平,因而应当重视有关问题的研究。本章拟就其中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作些探讨。

第 一 节

新中国教育方针改革

教育方针是党和国家规定的教育工作总方向、总目标,它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节试图简略地回顾新中国教育方针变革的历史,根据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制定一个科学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与具体建议,作为今后制定或修订教育方针的借鉴。

一、新中国教育方针改革的历史回顾

(一)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

新中国建立之初,亟需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保护人民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发展科学文化,培养建设人才。因此,刚建立的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名为三民主义实为封建主义、买办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宗旨,确认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

主义的教育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①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进一步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②这些方针明确了当时教育工作的性质、任务、方向，对于肃清国民党文教政策及旧教育的不良影响、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50年代中后期至“文革”期间的教育方针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此，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为了使教育事业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对教育方针作了变革。1954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中学会议提出：“当前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以国家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③同年6月5日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④这里虽然是中学的教育任务或目的，但反映了当时整个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发展的要求。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⑤1955～1957年上半年，教育界对与教育方针有关的“全面发展教育”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针对教育界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提出了他对教育方针的意见：“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⑥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

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⑨至此，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暂时确立。在以后的20余年里，教育方针的文字没有大的变动，只是有时将1958年的教育工作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为“两个必须”）。但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教育方针的实施有很大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⑩片面强调思想政治，否定科学文化，使50年代后期提出的教育方针遭到了破坏。

（三）新时期的教育方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全面纠正了“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提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应，中国的教育方针也发生了一些变革。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⑪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⑫这些文件坚持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未提“两个必须”。

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给《中国少年报》题词：“希望全国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体力的人。”1983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印共（马）同志时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被简称为“四有新人”、“三个面向”的